



三国争霸因何归晋

□ 陈忠海

东汉末年出现了群雄割据争霸的局面，经过多年征战，天下逐渐分裂为魏、蜀、吴三个政权，但出人意料的是，最终实现统一的却是晋朝，司马懿父子是凭借什么做到了这一点呢？

分久必合的内在基因

中国古代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由于幅员辽阔，地域特点和气候具有多样性，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特色和物产，各地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内在需求度很高，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大一统”的国家观念，认为天下是一个不容分割的整体。孔子亲自编订的《诗经》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孟子强调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这些思想都强调了统一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还发现，统一的中原王朝可以最大化节约行政成本，也可以最有效地保持社会稳定，所以一直以建立统一的王朝而努力。孔子等先秦思想家们提出“大一统”观念的时候，中国正陷入事实上的大分裂时期，春秋战国长达500多年的诸侯争霸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战争和巨大的经济损失，战国后期的李斯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统一”，努力进行兼并战争，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

由于分裂的时间太久，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而秦朝的国祚又太短，所以秦国只完成了“大一统”，而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汉朝取代秦朝，首先从思想上对“大一统”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再造和提升，董仲舒提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强调“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整套严密的政治结构，将整个天下统一在这套体系中。

汉朝以后，儒家思想由一种学派成为治国思想的核心，两汉400多年里一直持续不断地实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经学教育，“大一统”观念在此过程中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

想意识中。但是，东汉末年宦官、外戚轮番掌权，政治黑暗，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导致群雄争霸，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建立曹魏政权，东汉终结，但此时国家并未统一，刘备、孙权不久后也分别建立了各自的政权，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大一统”的实践遭遇挫折。

然而，无论曹魏还是蜀汉、孙吴，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他们承认分裂的现实，但不接受分裂的结果，所以都在为再次统一天下而不懈努力。从曹操到曹叡，曹魏祖孙三代一次次南征北讨，目的都是为了统一。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但他强调不是再造一个新王朝，而是刘汉王朝的延续，强调“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在国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诸葛亮和姜维先后10余次北伐。孙权也深感“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的局面，不断寻找机会主动出击，最终的目标也是实现统一。

曹魏错失统一机遇

在三国这个分裂的时期，统一反而成为时代的强音，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谁能把握历史潮流，谁就是最终的胜出者，在这方面曹魏无疑有着最大的优势。

如果以孙权称帝时的229年为时间点观察天下格局，在地图上所呈现的魏、蜀、吴3个政权的疆域面积或许相差不算太大，曹魏占据着北方，长江以南及广大西南地区是孙吴和蜀汉的地盘，但从经济总量、人口、军队数量等主要指标看，三方的差距其实非常明显。按照东汉末年的行政区划，全国共13个州，孙吴占据的主要是扬州、荆湘各一部以及交州，蜀汉则基本局限于益州。简单计算的话，13个州中曹魏实际掌握着将近10个州，孙吴和蜀汉相加仅有3个州多一点。这种综合实力的比较从人口统计情况也可以看出来，蜀汉和孙吴亡国时人口分别为108万和240万，而同时期曹魏的人口为537万，天下总体是“一强对二弱”的格局，但强者很强，弱者比一般人印象中的还

要弱一些。

但曹魏未能完成统一大业，有人归其原因于赤壁之战，认为这场战役中所出现的偶然性导致了天下的三分，这其实夸大了赤壁之战的影响，赤壁之战的直接后果仅是“三分荆州”而已，曹魏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无论曹操还是他的继任者，都有机会再次发动统一之战，而曹魏最终没有实现统一。

曹操自起兵以来，一生打了30多年的仗，几乎年年都在打，也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如官渡之战、北征乌桓之战和潼关之战等，但始终没能跨过长江，这里有孙刘联盟的作用，也有曹操在战术上的失误，比如没有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军，而曹操又喜欢亲自带兵征战，重要战役总是亲力亲为，手下缺乏周瑜、陆逊那样的“元帅级”人物，吴蜀抓住了这一弱点，通过协同作战，总是从不同方向同时发起进攻，令曹魏左右不能兼顾，比如曹操征汉中期间合肥方向就因此出现了严重险情。

三国归晋的历史意义

三国后期，吴蜀两国经过长期战争消耗，国力下降很快，曹魏在北方大范围屯田，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实现统一的条件更充分了，但曹魏依然没能完成统一。

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虽然没有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也不算昏庸无能，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在完成统一天下的事业中也做了许多努力，他们在位期间，曹魏在三国中的相对优势没有减弱。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中将“会当有变时”作为北伐胜利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曹丕和曹叡都没有给对手这样的机会，这也是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年）曹叡驾崩，年仅8岁的养子曹芳即位，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这项托孤安排首先就有问题，要么托付给一位重臣，如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要么托付给几位大臣集体辅政，如曹丕托孤于曹真、曹休、陈群和司马懿。曹叡将后事托付给曹爽、司马懿二人，又不分主次，



甚至让他们“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这为二人矛盾爆发埋下了隐患。

曹爽是个“德薄位尊”的人，能力平平，仅因为宗室的身份而骤然掌握大权，为防范司马懿，曹爽身边聚集了一帮亲信党羽，在他们的怂恿下，曹爽“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将司马懿逐渐架空。以为大权已经稳固，曹爽和同党们于是奢侈享乐，大量占有官田为私有，窃取官物，向州郡索取财物，曹爽本人“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还让何晏等人主持官员选拔，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卢毓、傅嘏等一批正直官员都因为小事而被免官，令曹魏大失官心和民心。

司马懿受排挤后一直隐忍不发，目的是让曹爽一伙的行径充分暴露，同时在等待机会。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司马懿父子借少帝曹芳和曹爽拜谒高平陵之机一举发动政变，消灭了曹爽一党，掌握了实权。此前所有大权几乎尽在曹爽等人掌握中，司马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得到了蒋济、高柔、王观等一批曹魏老臣的支持，他们对曹爽等人早有不满，都直接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政变。

政变时，许多官员发现城里有异动，预感到发生了大事，也都猜出了大概，但绝大多数

人都闭门不出，静观其变，这反映出官员们希望曹爽等人下台的普遍呼声。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最终按照“汉魏禅代”的模式又搞了一次禅让，曹魏被晋朝取代。

曹爽等人专权期间，曹魏内部失和，政治混乱，国力不断下降，其间也曾出兵伐蜀，但一场大雨就让其不了了之，反映出曹魏军队战斗力的衰减。虽然“一强对二弱”的总体格局未变，但强弱之间的差距如果逐渐减小的话，就会达到一种“恐怖平衡”，意味着谁都无法消灭对方，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三国分裂的局面可能不止数十年而会更长，也许会提前出现南北朝那样的大分裂时期。

后赵皇帝石勒评价司马懿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这个评价非常不公平。司马懿父子发动政变，无论其出于怎样的动机，从结果看其实产生了为北方政权“止损”的作用，制止了“恐怖平衡”的出现，最终使国家很快实现了统一，这才是三国归晋的历史意义所在。



体现的现代思想 《钱氏家训》

□ 钱志熙

的现象尤感痛心，希望子孙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因此之故，他很重视家族的伦理教育，提倡忠孝思想。

《武肃王遗训》所列十训，第一条就说：“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在政治上，他立足于传统忠君、民为重社稷次之、顺天应时等思想，为自己及子孙确定“保境事大”的基本国策。这表现了他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封建道德观念的执守。在五代十国时期统治者道德普遍沦丧的局面中，钱镠的这种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武肃王遗训》中，他以忠孝为本的传统思想教育后人：“尔等现居高官厚禄，宜作忠臣孝子，做一出人头地事，可寿山河，可光俎豆，则虽死犹生。倘图眼前富贵，一味骄奢淫佚，死后荒烟蔓草，过丘墟而不知谁者，则浮生若梦矣！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这些当然出于一个统治者维护政权的考虑，但也体现出可贵的民本思想。

钱镠不仅以孝著称，同时对于祖先、氏族十分重视。他临终时告诫子孙不要因今日王业贵显而忘记自己的祖先：“今日兴隆，化国为家，子孙后代莫轻弃吾祖先。”并且自觉地将自己作为家族传统的继承者，作《钱氏九州庙碑记》，立遗训，以教育子孙后代。《武肃王遗训》第十条中说：“吾立名之后，在子孙绍续家风，宣明礼教，此长享富贵之法也。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从这个意义上说，钱氏家族自古以来就有比较强的儒家宗法意识，重家教，尊家训，而吴越王钱镠应该是钱氏家训的创始者。

古代与近现代伦理观念兼而有之

钱文选撰辑的《钱氏家训》，是一份既古老而又具有近现代性的家教文献。说它古老，是因为它与其他家训不同，是根据钱镠《武肃王遗训》《武肃王八训》等钱氏宗族的旧家训而撰写的，其中体现了孝亲、顺天、爱民的思想。《家庭》节中如“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等，保留了传统家训孝亲敬宗的内容，强调家庭乃至宗族成员互助济济的重要性。至于顺天，的确是吴越钱氏的祖训。保境事大，纳土归宋，核心思想就是顺天爱民。《个人》节中云：“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以“天地”为最高的原则。所谓天地，亦即宇宙自然及其所昭示的自然规律，它与人类的道德诉求是相呼应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就越使内心充满清新而日增的惊奇和

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中国古代的天地思想，与康德的上述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

由于吴越钱氏“化家为国”，所以《武肃王遗训》所体现的精神，是治家与治国并重的。《钱氏家训》承传了这一原始因素，与同类的家训、治家格言相比，有极强的国家、天下的意识，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国家》一节中。其中也体现了古代与近现代伦理观念的交融，如“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等等，体现以法治国、民主群议等现代政治思想。《钱氏家训》对于义利问题，也有较好的看法。理学家的义利观，重义轻利，《钱氏家训》对此有发展，强调谋天下国家之大利，不谋一己之私利；“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这些格言，虽然以古老的修辞形式出之，但其中表现的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

作为一种格言文学，《钱氏家训》以其后出之故，大量吸收儒家经典及其他家训、治家格言的思想，也十分重视社会大众的伦理观念与道德信条。《钱氏家训》在文字表达上有通俗的特点，对一些传统社会一直流行的道德教训与人生准则，作了较好的归纳。如《社会》一节，说的都是大众推崇的基本行为准则：“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推难解纷。”这些内容，广泛地见于其他族规、家训，也是民间广为流行的道德信条。

应该说，《钱氏家训》是吸收了传统格言文学以及社会大众的基本伦理观念而撰写的。它当然也继承吴越钱氏的家训传统，但不应该过于夸大它与钱氏家族某些文化现象的关系，更不能将其视为钱氏氏族的一家之训。说到底，它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道德观念较好地结合的家训文本，也带有家训、族规之集成的性质。

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我们常看到许多宗族的谱牒中族规家训，有些内容与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方式是相抵触的。比如流行最广的《朱子治家格言》，也表现了男权社会的某些偏见，并且有比较明显的果报思想。《钱氏家训》由于产生于思想趋于开明的近现代之际，较少这方面的缺憾。



（上接1版）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适应的矛盾作用，是推动社会变革、推动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依据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说的是人民的需求从量的需求提高为质的追求，而“平衡”“充分”强调的是社会发展从量的增长提升为质的提高。正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中国虽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已经开始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在继承发展中创新创造

历史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思想。善于进行开创性的理论探索 and 思想创新，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

继承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划分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近代百年为“站起来”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富起来”而进行的改革建设，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强起来”而奋斗，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

创新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一个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又一光辉典范、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进程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每一步进程，都透射出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充分体现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引领新时代

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有具体的时间表，还有科学的路线图。科技强国战略、网络强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一系列强国战略的提出，夯实了中国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引领力就体现在指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中确立、检验、发展，必将以巨大真理伟力和实践伟力引领“复兴号”中国巨轮驶向光辉的彼岸。

指引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科学社会主义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是我们不断增强“四个自信”的客观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让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加旗帜鲜明。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生机活力的重要源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能够在21世纪中国焕发生机活力的根本保障。

绘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图景。当前，世界格局在变，发展格局在变。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倡导共同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绘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图景，让世界更深刻地认识了反映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彰显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作者系陕西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